

## 红色文献资料综述

赵莉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红色文献资料主要指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起至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之前,由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所出版、发行、制作的各种文献资料,因其史料性较强被人们誉为“现代文物”。本文对红军长征时期及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红色文献资料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红色文献资料;红军长征时期;陕甘宁边区时期

[中图分类号]K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8-0031-06

红色文献资料主要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起至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之前由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所出版、发行、制作的各种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党的领袖的著作、党组织各类文件及根据地出版的各种书籍和报刊杂志等。红色文献因其史料性较强被人们誉为“现代文物”。红色文献是在十分艰苦的战争年代中发行的,当年的印制数量本来就不多,又经历了持续战火的洗礼,故留存下来品相好的书刊很少,有些到今天已成为孤本。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及收藏价值。



劳模李焕章参加会议通知



三八五旅奖状



陕甘宁边区给劳模李焕章的奖状

### 一、红军长征时期的红色文献资料

#### (一) 标语

在墙壁上和木板上的标语都有保存下来的,甘肃的主要发现地是甘南和河西地区。主要内容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包括民族宗教政策),呼吁团结抗日。如“共产党是领导全国民众抗日的政党”,“建立抗日的西北根据地”,“誓死保卫中国”,“联合各党各派的力量,一致对日作战”,“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军民联合红军抗日反蒋”,“番民组织自己的政府管自己的事”,“信教自由,保护清真寺”等。这样的标语在四川、宁夏等地也有发现。

#### (二) 印章

甘肃省博物馆举办的“中共甘肃党史展”展出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印章,木质,圆面,方柱钮,面径10厘米,钮长8厘米。印面文字上下沿边布局,中间为地球,上为

镰刀斧头。此印章发现于甘南地区迭部县。1939年9月,毛泽东等率领的长征中的红军左路军进入甘肃。9月12日,党中央在迭部县的高吉村(又称俄界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兼财政部长的林伯渠参加了会议。甘南地区山高路险,森林密布,再加上小股不明真相的藏民武装的骚扰,在紧张的行军途中,林伯渠的两个箱子丢失了。关于此情况,在《林伯渠日记》中有记载:1935年9月15日、16日,随身携带的两个“背子”(即用于背物品的用藤条和绳子编的背篓)丢失。这枚印章可能是这次遗失物品中的一件。

### (三)没收财产证

为二联证件的右半部分,纵14厘米,宽13厘米。证上竖写:“查得□□□□勾结卖国军阀鲁匪压迫民众,我抗日红军到此即有群众报告。兹为清除抗日障碍,顺利抗日,特宣布没收□逆财产一部发给本地群众(部充作抗经费)。”落款为“中国抗日红军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副主任李卓然”,时间为1936年8月16日。1936年8月初,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长征中的红军左路军队进入甘肃南部,制定了《岷洮西固战役计划》,随后开始实施战役,从8月5日到9月初,红军在岷县、临潭一带给军阀鲁大昌部、马步芳部以沉重打击。在此期间,红军还开展了建党、建政、扩红等活动,为继续北上做准备。

### (四)壁报《怒潮》专刊

征集于甘肃省岷县西川区雅乌乡。长118厘米,宽55厘米。壁报的左上部有刊头题字“怒潮”,上面绘有的人物,落款时间为1936年9月18日,并标明为“第一期”。这充分说明,即使是在紧张的行军和作战之际,长征中的红军对宣传工作始终很关注和重视。

### (五)《红军须知》宣传文书

《红军须知》宣传文书为薄桑皮纸质,纵10厘米,宽8厘米。其第4页左边缝处印有“红军须知”和“第三册”字样。文书后署“红二十五军印”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翻印”等字样,时间为1935年9月10日。文书中的内容主要为红军中为什么要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的职责与工作,政治部是什么,苏维埃是什么,红军的宗旨是什么,红军的纪律有几条,红军经常做些什么工作,怎样才能是好的革命战士,常夫、伙夫、勤务、马夫十大注意等。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师于1935年9月,会师的时间和经过有关文献中有记载。程子华等

著的《红二十五军的长征》:“(1935年)9月7日,我军到达陕甘根据地保安(志丹)县的豹子川,鄂豫皖省委在此开会,决定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9月15日,在陕甘边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声中,到达延川县永坪镇。”《红军须知》中的内容,主要涉及红军中党的领导作用和政治工作、宣传苏维埃政权、对士兵的纪律和职责的规定等。这份《红军须知》是第三册,因此在此之前红二十五军一定印过第一、第二册。这说明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军队中党的建设和军队中士兵的纪律和职责管理十分严格,宣传工作也很积极。

### (六)《中国共产党党章》

《中国共产党党章》为薄光纸张,油印本,纵12厘米,宽10厘米。征集于甘肃省张掖市。扉页图案由三部分组成:上部为光芒四射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中部为地球图案,并书“中国共产党党章”;下面书“第三十军政治部翻印”,再下为时间“1934.4.5”。正文内容计有15章53条。这份党章的内容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相同。这个党章中的内容包括党的名称、党员、党的组织系统、支部、城乡区的组织、县或市的组织、省的组织、党的全国会议、党团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互相关系等。根据党章上所记时间,1934年4月,活动在川陕根据地的红三十军政治部曾经翻印了六大通过的党章。1936年底到1937年初,在红西路军中这个党章仍被西路军战士保存着。这个时期,红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张掖一带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高台战役、倪家营子战役中许多红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董振堂、杨克明等烈士都是在高台战役中牺牲的。在如此艰苦的岁月里,党章仍被红军干部战士携带在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

(七)盖有“中国共产党红四方面军第卅军党务委员会”方形印章的党证

党证为纸质,纵19.5厘米、宽13.5厘米,上有列宁、斯大林的头像和五角星、镰刀、斧头图案。下部为表格,空白。有姓名、籍贯、住址、年龄、性别、何时何地入党、何人介绍等栏目。

### (八)《争取藏民的歌》

《争取藏民的歌》为油印歌本,长12厘米,宽10厘米,计20页。内容为“十要十不准”,音乐调采用“小放牛”的曲调。歌词部分内容如下:

## 一

目前的工作,什么最重要?  
红色指战员,样样要做到。  
争取那番民,怎么做得好?  
怎么使番民们,拥护我红军?

## 二

少数民族的,工作最重要。  
十要十不准,样样要做到。  
接近那番民,乡亲如兄弟。  
打汉官和帝国,拯救那番民。

## 三

十要十不准,什么人号召?  
里面包含着,什么内容呀?  
十要十不准,一共几条?  
怎么能使那,条条都做到?

## 四

十要十不准,政治部号召。  
一切的纪律,具体规定了。  
十要十不准,一共二十条。  
一个个都清楚,条条都做到。

歌词的后面署有“总政治部,三月十六日”。“三月十六日”即1936年3月16日。在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中,第一方面军进入藏族群众聚居区是1935年的5~9月。红二方面军是1936年的4月底到达四川甘孜藏族聚居区,7月与四方面军会师。根据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的记述,红四方面军是1936年2月上旬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向康定等地转移的。1936年3月15日,红四方面军总部进驻炉霍。他记述:这一带“是以藏民为主的藏汉杂居区域。藏族土司、喇嘛权力很大,是实际的统治者。喇嘛庙林立,县城的庙宇盖得金碧辉煌,气势非凡,象征着佛教的显赫地位。喇嘛寺均拥有大批的土地、粮食、酥油、金银和牛羊,并有武装自卫。陈昌浩、刘伯承所部在炉霍的一座寺院,即获得粮食1万斤、羊毛10万斤、盐4万余斤,及一批贵重药材、金银器、毛毡、武器弹药等。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我军放宽了对土司、喇嘛的政策,尽量通过和平谈判,令其停止武装抵抗。用借贷的方式,取得我们急需

的军用物资”。可以肯定,《争取藏民的歌》当为1936年3月在四川制定的。由于3月15日已进入藏区,很可能在此之前就进行了策划和宣传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制定尊重少数民族信仰和生活习惯的措施,对保证红军的供给、顺利地通过少数民族地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藏族地区制定的有关少数民族的政策,在进入甘肃后仍然继续执行。甘肃省博物馆的收藏品中,有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甘南地区时的写在木板上的标语,有“红军公买共卖”,“对回番民族不压迫”,“番民自己管自己的事”等。许世友在回忆中写道,红军在经过藏族聚居区时曾喊话给藏民,所喊的内容有“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提倡信教自由,保护藏回蒙民的利益”。这种通俗的文书式样,与1935年春红军在大凉山地区以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非常相近。这张布告中有这样的句子:“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负。”

### (九)对回民的《八要十不准》宣传文书

对回民的《八要十不准》宣传文书为纸质,墨写,一页。“八要”的内容为要保护清真寺、要保护回商、要号召群众回家、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要联合回民抗日救国等。“十不准”的主要内容为:不准不尊重回民的饮食禁忌、不准不尊重回民妇女和宗教人士、不准随便乱翻经书、不准到回民群众家里乱翻、不准在清真寺周围吵闹、不准打回民的土豪等。红军长征进入甘肃以后,就将对回民习俗尊重的宣传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执行。1935年10月,进入甘肃、宁夏回民聚居区的一方面军对红军执行回民政策做了具体的规定、要求:进回民村须先派代表与回民接洽,经对方同意后才可进村宿营,否则就在野外露营;对回民宣传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保护回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红军对回民执行少数民族政策时应执行的“三大禁条”是禁止入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1936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又重新颁布了“三大禁条”,并增加了“四大注意”,即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注意回汉民族的团结。对回民的《八要十不准》宣传文书为我们认识和探讨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和文化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二、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红色文献资料

### (一) 领袖著作

领袖著作主要有马恩列斯等无产阶级导师的著作和共产国际的纲领性文件,如《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论共产国际》中译本、《共产国际纲领》中译本、《列宁主义问题》中译本、《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许多是首次印刷出版,计有《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反对自由主义》、《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组织起来》、《论联合政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时局的声明》。另外,还有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徐特立、林彪、贺龙、刘伯承、项英等人有关抗日战争战略战术文章的文集《抗日游击战争之理论与实践》等。以上著作对研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宣传、了解革命导师和领袖的人生经历是弘扬优良学风的一个重要手段。马、恩、列、斯的传记作品,以及反映他们在特定时间革命经历的作品也受到欢迎,如《列宁在 1918 年》、《斯大林与红军》等。延安时期,毛



毛泽东像

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激励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延安时期的出版物,无论书籍或刊物,许多在封面印有毛泽东头像。学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的思想在陕甘宁边区蔚然成风。

这方面也出版了一些书籍,如《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毛泽东印象记》等。

### (二) 反映党的建设方面的书籍

陕甘宁边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书籍中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也非常丰富,当时整党方面的经验和典型都汇集成了资料,如《土改与整党的三个典型经验》、《党建论文集》、《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共产党》。还有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学习

培训的参考书和教材,如《党建概要》、《共产主义常识》、《支部课本》、《国民党与共产党》、《党团怎样工作》。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组织形式,目的在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组织。1937 年 5 月,根据议会民主制度的原则,陕甘宁边区制定了《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选举条例》。接着就开始了第一次民主普选运动,规定一切赞成抗日的人们不分阶级、党派、性别、民族、信仰,不受财产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民以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方式选举各级参议员和政府领导成员。1939 年 1 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正式召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曾召开过三届四次会议,每届都编辑出版了会刊,如《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丛刊》等。

### (三) 文学作品与文艺著作

陕甘宁边区时期,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感召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贴近广大老百姓、反映火热生活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是研究陕甘宁边区时期文学运动和文艺创作的第一手资料。《游击战术唱词》是抗战时期出版物,用北方快板的形式,将游击队的任务使命、机构编制、行军宿营、战斗战术等进行了通俗概括。唱词压韵顺口,配以木刻插图。《唱词英雄会》是用陕北民歌曲调编撰的歌颂英雄的文艺作品,主要内容有穷人翻身当英雄、见了救星毛泽东、七十二行有状元、竞赛创造模范乡、机关部队出英雄、开完大会发奖品,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学习劳动英雄运动。秧歌剧本《小放牛》是男女二人对唱、宣传抗日斗争的剧本。当时的文艺作品还有《干一场》、《救中国》、《抗战进行曲》等歌曲及李季创作的广泛流行于陕甘宁边区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这方面的书籍还有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贺敬之的《白毛女》,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

新秧歌运动的开展丰富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的文化生活,这方面的出版物有《民歌小调》、《秧歌小调》、《儿歌》、《新秧歌集》、《歌唱南泥湾》、《刘志丹》。学习劳动英雄是陕甘宁边区精神激励的一个重要办法,对呼唤人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培养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许

许许多多的劳动英雄，一直到今天都是社会应提倡和学习榜样。歌颂劳动英雄，是陕甘宁边区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一项重要工作。边区的文学工作者撰写了大量的的小册子来讴歌边区的英雄，这方面的出版物主要是宣传劳动英雄的一组小丛书，有《建设槐树庄的英雄胡青山》、《植棉英雄郭秉仁》、《高仲和、李文焕创造了打盐奇迹》、《张庆丰运盐奇迹》、《磨房起家的王科》、《边区工人的奇迹赵占魁》、《青年劳动英雄李长青》、《难民劳动英雄陈长安》、《气死牛英雄郝树才》等，

#### (四)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著作

陕甘宁边区时期，除学校外，学习型组织还有部队和农村的学习小组、读报组、扫盲组、墙报组等，出版了大量的既有政治性又有学术性的教材和讲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很好地将现实问题、实际问题、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比如在历史研究方面，就出版了一些当代史和近代史、世界史的著作，如《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杨之华著）、《日本革命运动史话》、《美国工人运动》、《中国政治思想史》、《社会进化简史》、《中国近代史讲话》、《中国苏维埃运动史》、《近代世界革命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苏维埃建设讲义》（出版时间为1936年11月16日）、《中国东北民主联军十四年苦斗史》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间并不长，这方面的内容除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有披露，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巴黎《救国时报》连载外，延安大众书店出版了赵文华的《从江西到陕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顽强的革命精神，可歌可泣。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东北问题，国共两党争夺白热化的时刻，穆青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于1946年3月在《解放日报》连载，不久结集出版，对民主联军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对打击敌人、鼓舞士气无疑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时期很重视当代史的研究。研究的这些成果很快被运用于历史教学中，辛安亭编写、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华北书店出版的《民众课本》第一册（现存陕西省档案馆）中的课文中有《九一八事变》、《东三省》等，高小适用教材《历史课本》第三册（现存陕西省档案馆）中的课文中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共的产生和工人运动》、《苏维埃运动》、《卢沟桥事变和全面抗战》等。

#### (五) 布告、命令、指示、文电、宣传品等文献资料

布告和告民众书具有张贴告示、公开透明、广泛宣

传的功能，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普遍使用。如《中国抗日人民红军政治部布告》，纵37厘米，宽27厘米。内容为：

我军已于五月十五日之后以宣布停止筹粮，六月份概用现金购买给养。顷据平凉泾川边区发觉汉奸亲日分子假冒红军名义，甚至身穿红军服装，戴红军帽子勒索拷榨人民粮款，殊为可恶。以后再发现有假冒红军名义要粮要款人民团体机关有权力逮捕，送交驻军处置，给以严格惩办，以昭炯戒，以安地方。切切此布。

印戳为“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署名是主任王新亭、副主任谢扶民，时间为1937年6月2日。



1937年抗日红军政治部布告

1937年6月，为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谈判之机，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前夕。这个布告对研究当时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一，中国工农红军的部队番号，如“方面军”的称呼在1937年的6月仍然保持着。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曾在陇东地区的平凉、泾川进行过征粮工作。这一带属泾河谷地带，比之于陕北陇东的塬上县份收成要好。第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充满了斗争和严峻性，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红军武装时刻准备着与侵略者战斗的同时，非常慎重地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为驻地的老百姓利益考虑。

《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 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布告》是关于发布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的联合布告。《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正



陕甘宁边区土地证



陕甘宁边区土地章

式公布于1947年10月10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公开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封建的战斗旗帜,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纲领,对于推动新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起了巨大作用,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这张布告说明,当时对《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广泛宣传和执行是解放区党政军的一项重要职责,1947年12月布告执行之前,曾在部分地区实行了试点工作。

《为了抗日救国实现民主自由释放上海爱国七大领袖〈告各界同胞书〉》为油印件,纵20厘米,宽27厘米。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解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等文件宣言,向全国各党派提出了五项建议,呼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等人又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也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联合战线。正当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之时,



要求释放“七君子”的文书

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11月23日凌晨逮捕了沈钧儒等“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纷纷举行援救活动。西安事变时期,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同宋子文、宋美龄达成六项共识,其中一条是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政治犯,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释放“七君子”是在1937年7月31日。这份《告民众书》是以中国抗日红军的名义散发的。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谈判。因此,可初步断定,颁发时间是在西安事变之前。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停止内战、争取民主方面是有共识的。

命令、决定、决议具有强制性,是以公文的形式来传达需强制执行的任务。报告是下级向上级汇报的文件,有铅印本和油印两种。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为油印本,中华民国三十一年(1942)发布。“命令”称: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议规程经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中心修正通过,兹公布实行。《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发布《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而签发的命令,命令高等法院、各专员公署、县市遵照执行。

《陇东专员公署命令》为陇东地区专员公署就“减租情况”及为“总结经验教训”致各县县长的命令。时间为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专员马锡五签发。

《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议》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印刷,铅印,共9页,时间为1948年1月。主要内容有:我军进入蒋管区后,一是大量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二是禁绝灵活地执行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扩大我军消灭胡、马匪军的正规部队;三是分化帮会等组织,争取下层群众;四是在新的解放区,要取消国民党政府和非法组织,对其中贪官污吏、豪绅恶霸、特务分子等为人民所痛恨者,应组织临时法庭,予以公审查办;五是保护工商业者,使之正常营业;六是合理解决部队给养;七是采用新方式,搞好我军的政治工作;八是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训练,抓好军队;九是开展诉苦三查运动,纯洁队伍,加强支部工作,保证现行政策顺利进行。这是西北局和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落实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任务、军队工作、城市政策等指示的决议。这份决议对研究西北野战军历史具有参考价值。